

粤港澳大湾区外语人才的国家意识培育*

——基于课程思政的视角

王真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国际经贸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63)

[摘要] 国际外部环境变幻莫测、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架构及战略定位、外语习得的独特性及外语教育的政治性, 决定国家意识是大湾区外语人才培养重心, 可为国家安全提供战略保障, 为经济发展提供优质人才支撑, 更为大湾区文化传承与国际传播提供基础。通过阐释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内涵及核心构建, 论证“外语课程思政”与国家意识在本质内涵、价值取向、培育方式、实践内容和发展构建上存在高度耦合, 两者具有本质上的同构性。课程思政是形, 国家意识则为魂。培育外语人才的国家意识需以课程思政为载体, 通过课程思政的话语实践进行内化与习得。当前大湾区外语人才的国家意识培育面临“国际化”与“本土化”导向失衡, 外语教育的人文价值无法充分体现、国家意识未进入外语教育规划顶层设计、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实施尚未达到理想状态等困境。基于课程思政的视角, 从顶层设计、教师发展、教学实践、教学资源四个维度提出大湾区外语人才的国家意识培育路径: 以课程思政为载体, 将国家意识纳入外语人才培养方案; 树立外语教师国家意识理念, 搭建外语思政虚拟教研室; 以增补融合方式重构课程体系, 创新教学实施, 凸显国家意识培育; 开发彰显中国特色和区域文化精髓系列教材, 构建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

[关键词] 大湾区 外语人才 国家意识 课程思政

[中图分类号] G4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4)04-0151-10

一、引言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 其质量决定发展的底蕴与后劲; 国家意识是激发爱国情怀、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基础。唯有两者结合, 具备强国家意识的人才方能自觉报效祖国, 助力民族复兴, 成为社会进步的驱动力。

2019年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十四五”规划纲要也强调支持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2]人才是发展的核心驱动, 为推动战略实施, 2021年9月, 习近平在中央

收稿日期: 2023-03-17; 修回日期: 2024-05-07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2021年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大思政’格局下广东外语类学生的国家意识培育路径研究”(2021GXSSZ206);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共建课题“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新时代广州国际型外语人才的国家意识培育研究”(2021GZGJ111); 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课题“‘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的‘金课’课程发展研究”(2020GXJK278)

作者简介: 王真, 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外语教育、外语教育技术研究。

人才工作会议上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可在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3]支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湾区对标其他三大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是中国联通世界、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重要载体,国际语言服务必不可少,外语人才自然是高水平人才高地群体结构的基础,大湾区发展战略的实施,优质外语人才储备不可或缺。

那么,何谓优质外语人才?大湾区的外语人才培养需要注意什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

“9+2”区域架构的大湾区,地处我国沿海前沿,属滨海经济形态,是典型的多语言、多文化、多意识形态交流交锋高地。同时,语言本身是意识和文化的载体。不同语言蕴含不同的文化结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由于语言习得的这种特殊性,外语学习者易受目标语所蕴涵的文化价值体系影响,而弱化对母语国家文化的认同,^{[4](P89)}引发思想意识冲突。大湾区外语学习者若自身价值观尚未稳固,国家意识单薄,则极易受到干扰,出现政治定力差,敏感度低,价值取向多元化,自我意识凸显,爱国之情难以转化为爱国之行、民族虚无主义等问题,影响大湾区国家发展战略实施,严重时,甚至威胁国家安全。因此,国家意识无疑是大湾区外语人才培养的重心。唯有强化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培育,才能真正培养政治立场坚定,服务国家的优质外语人才,筑牢人才高地的根基。

二、研究综述

国家意识研究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已逐步形成体系。但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研究则是一个新的研究分支,自2019年由杨枫提出,^[5]受到学界关注。通过CNKI数据库,以“国家意识”或“国家认同”与“外语”为主题词(数据截至2023年5月),检索到65篇相关文献,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其中杨枫从文化政治学角度提出外语教育不是简单的客观知识学习,而是

建构性和固化性,带着西方思想的外语知识参与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构建着中国的社会秩序,影响中国的社会发展。由此,语言的文化性和政治性要求外语教育必须把国家意识培育置于外语学科的发展中;^[6]王真对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其培育的内在逻辑及核心构建;^[7]王银泉从学科建设的视角,提出外语学科必须平衡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呈现明确的国家意识;^[8]王靖潭、赵丹等从外语教材的视角提出国家意识教材观;^[9-10]张法连,陆贝旒等从国家翻译实践的视角,提出翻译教学中的国家意识培育;^[11]徐斌从教学实践的视角,探析大学英语课程中的国家意识培养。^[12]

从上述研究成果看,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研究数量呈增长趋势,研究热点逐步形成,研究视角呈多元分布,主要集中在内涵结构界定、国家意识与外语学科发展、教材建设的国家意识元素、国家意识与翻译研究、国家意识培育的教学实践等方面。但由于刚起步,整体的研究多停留在印象和经验性的论辩上,理论与实践研究尚未形成体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时代内涵与构成等学理分析缺乏共识性,与课程思政的同构性论证、外延培育等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2) 新时期、新区域经济背景下,外语教育国家意识培育所面临的新机遇、新要求和逻辑起点等研究需进一步深化;

(3) 针对不同区域经济,系统的外语教育国家意识培育实践体系尚未形成。全球化经济发展,多语种、多文化与多意识形态并存的经济区域呈增加之势,如大湾区,属典型滨海经济形态,由诸多港口城市和城镇组成的集群,同时香港、澳门与同属大湾区的其他城市政治体制有别,语言政策有异,^[13]是多种意识形态与文化交流交锋之高地,针对这样的经济区域进行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培育非常必要,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当匮乏。

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推进与指导高校课程思政的建设与实施,^[14]为外语教育改革提出新方向。同时,外语课程思政建设与国家意识培育具有一脉相承,异曲同工的耦合性。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是通过外语课程思政的教育话语实践不断内化和习得的国家信念建构,^[15-16]与教学主体、教学过程、课程内容等密不可分。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阐释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内涵结构,论证“外语课程思政”与“国家意识”同构性,阐述大湾区外语人才国家意识培育的逻辑起点,结合当前大湾区外语人才国家意识培育面临的困境,以课程思政为载体,探讨大湾区外语人才的国家意识培育路径,以期为大湾区提供优质人才保障,促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人才高地建设,推动国家发展战略实施,也丰富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为外语学科的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三、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学理分析

(一) 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内涵结构

国家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由于学者的学科领域和研究角度不同,其概念尚未统一,但实质是一致的。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国家意识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国家的态度、情感、认知以及信念、习俗、价值认同的复合存在形式;^{[17](P22)}国内学者于海从政治学的角度认为国家意识是对某一特定的民族国家及其传统、制度、文化的归属,并由此而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情感、信念和生活方式;^[18]张华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把国家意识看作是国际社会成员的一种身份意识,对该国在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地位的阅读,它亦是国家对“自身”“他者”和国际社会的一种认识。^[19]杨枫从国家学的角度认为国家意识是公民基于国家历史、民族和文化的科学认知而形成的对国家政治法律的归属认同,也是思想、情感和行动上对国家认同的理性实践。^[20-21]

通过上述概念,我们可总结以下两点。

其一,国家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历史性和发展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与政治、经济、制度、传统、文化、区域等元素有着天然联系,随时代的变迁而演进,理解国家意识内涵既要秉承传统国家意识的内核,也需富有时代特征。^[22]

其二,国家意识的形成必须以国家认知为基础,包括历史、文化、经济、制度,与“他者”间国际关系等的认知。国家意识只有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情感归属,进而激发思想和行动上的理性实践。

由于国家意识具有时代性,在外语教育语境下理解国家意识,就必须考虑外语教育的历史使命。许国璋先生提到:外语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服从国家利益。^[23]当前中国要加快进入世界舞台中央的步伐,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价值观、生态理念等介绍给全世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些正是时代赋予外语教育的历史使命。因此,结合两者,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是指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基的外语教育语境下,所培养的外语人才对本国人文、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的认知认同,由此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责任感,并作出服务民族复兴大业,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等价值选择和行为实践的情感与心理总和。^[7]

国家意识是归属意识、身份意识,政治意识和认同意识。意识是认知系统和情感系统相结合的复合结构体系,表现为知、情、意三者的统一。^[24]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发展必将遵循认知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发展与转化逻辑,形成认知、情感、意志三者的递进发展关系,其核心构建包括国家认知、国家认同以及国家责任三个部分。^[7]其中,国家认知涵盖外语人才对本国的历史认知、文化认知、政治认知和国际关系认知,是外语教育国家意识形成的基础;国家认同是指在国家认知的基础上,以跨文化为视角,通过批判性思维与外国进行全面客观的比较,进

而形成情感归属与认同；国家责任是情感认同进一步内化为外语人才的个人价值取向，形成对国家强烈的责任感，并激发爱国行为的践行。^[7]

（二）“外语课程思政”与“国家意识”的同构性

就本质内涵而言，课程思政是一种思想工作理念，即“课程承载思政”与“思政寓于课程”。^[25]外语课程思政赋予外语教育政治内涵，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将价值观引领与语言知识传授和语言应用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并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26]本质就是立德树人，回归外语教育的育人功能，培根筑魂，启智润心。其实践过程是围绕全球视野、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创新精神、道德修养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帮助学生认知国家人文历史、政治经济及中外语言文化的价值内涵，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跨文化理解与比较，形成国家认同，文化自信，最终助力学生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培养能够自觉践行国家意志，服务国家，传承、创新与传播中国文化的^[27]外语人才。这与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内涵结构高度一致，且两者同属思想政治教育范畴，聚焦价值取向培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以培养立场坚定，文化自信，有本有源，践行使命的外语人才为主旨。

就培育方式与实践内容而言，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培育与外语课程思政的实施都非一蹴而就，而是全程全方位全员培育的过程，且多属隐性教育，以润物无声，盐溶于水的方式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在实践内容上，《纲要》对文史哲类课程思政建设指导意见是“在课程教学中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专业知识教育引导^[28]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4]这与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核心构建中的国家认知范畴高度契合。其次，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核心建构涵盖国家认知、国家认同与国家责任三个阶

段，从认知、情感到内化践行，逐层递进上升，与外语人才的课程思政素养发展阶段（基本认知阶段——跨文化比较阶段——自觉践行阶段）^[27]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与外语课程思政在本质内涵、价值取向、培育方式、实践内容、发展建构上具有高度耦合性。国家意识作为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存在，^[15]具有丰富而饱满的理论涵摄力，既是属性上的政治社会信念，又是外语教育的文化话语实践，与外语课程思政具有本质上的同构性。国家意识可在理论与实践上指导课程思政建设和立德树人工程，^[6]为课程思政的全面推行提供明确方向与实施内容。同时，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作为社会信念亦是^[21]通过外语课程思政内化或习得的话语实践。

四、大湾区外语人才国家意识培育的逻辑起点

（一）从国家安全角度：提供发展战略保障

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全球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革，世界进入动荡期，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调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依然横行，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其中，文化政治化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新战争，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28]大湾区地处我国沿海前沿，各种文化与意识形态激烈碰撞与交锋，加之香港与澳门经历过殖民时代的无根教育，殖民意识根深蒂固，国家认同、身份认同的困境始终存在，^[29]大湾区的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不容小觑，这些关乎祖国南大门的安全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国家意识是对基于血缘、地缘以及文化等多种因素所形成的情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责任感，是国家向心力与凝聚力的基础，^[22]是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的基本防线。唯有强烈的国家意识，才能激起民众的爱国情怀和团结意识，筑牢意识形态安全的“护城河”，并辐射港澳，帮助港澳同胞重建历史意识中缺失的国家意识，实现人心回归，

稳定国内政局,助力国家统一大业,推动大湾区建设和国家发展战略实施,提升国际地位。

(二)从人力资源角度:提供优质人才支撑

优质人才是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第一要素,实现强国的关键战略资源。人才的质量代表一个地区的综合实力,也是城市群发展的战略基础。大湾区作为一个对标国际湾区的世界级城市群,其战略定位和发展规划,决定外语人才不可或缺。然而,仅仅是精通外语,能用外语进行交流的语言能手是不够的,国家需要的是具备强国家意识,能践行国家使命的优质外语人才。倘若政治立场不坚定,没有服务国家的决心,语言能力再强,又有何用?只有视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为己任,才能在国际交流中坚定立场,维护国家利益,推动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与战略实施。否则,培养出来的“外语人才”食洋不化,没有中国心,没有道德魂,^[30]崇洋媚外,用自己“嘴”说着别人的“话”,在西方文化的鼓噪中顺拐投降,^[5]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最终只会威胁国家安全。

大湾区立足打造世界级人才高地,外引内培是主要途径。大湾区拥有180多所高等学校,高等教育体量庞大,且具备完整学科体系,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强。其中,广东以“打造南方教育高地”和“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为总目标和总抓手,^[31]更成为大湾区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加强大湾区外语人才的国家意识培育,全面推行外语课程思政建设,方能培养大批符合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兼具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自觉践行国家意志的优秀外语人才,并发挥人才的辐射引领作用,为大湾区发展建设提供强大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三)从人文价值角度:提供文化传承基础

大湾区“9+2”的区域架构,是岭南文化的核心区域,在历史渊源、区域地理、人文精神、文化风俗上有着深厚的人文价值链,包含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等三个民系文化、以及受英国、葡萄牙等西方文化影响,在中外交流中逐渐形成的舶来文化等,形成人文湾区的文化

根源与基础。同时大湾区作为祖国南大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东南亚乃至世界重要的交通枢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32](P2-3)}也是东西文化交流互鉴、古今文化融汇贯通之要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共建人文湾区”“塑造湾区人文精神”“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1]在某种意义上也赋予大湾区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历史使命。

文化软实力、国际话语权的提升离不开叙事话语体系,大湾区故事、中国故事讲得好不好与外语人才的国际传播能力息息相关。外语人才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国际交流和文化传播的桥梁,更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生力军。大湾区外语人才的国家意识培育,有益于提升外语人才的文化素养,加深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尤其是岭南文化的认知与理解,更为外语人才的国际传播提供素材和基础。

五、大湾区外语人才国家意识培育面临的困境

(一)外语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导向失衡

如何平衡外语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实质就是处理国际视野与国家意识两者关系,这也是外语教育需明确的基本问题。外语教育的本质就是人文素质教育,其使命是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实现民族复兴。^[33]语言习得的规律性决定外语人才的培养需优先发展国家意识,在此基础上拓展国际视野,二者不可偏废,甚至不可颠倒,^[34]唯有坚持国际视野与母语文化互为主体,立足本来,吸收外来,才能使其培养的人才成为有本有源,顶天立地的国家栋梁。^[5]

大湾区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是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人心相通、文化互通、科技联通的重要节点,对标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推行外语教育的国际

化,提升外语人才的全球意识,拓宽外语人才的国际视野,自然成为大湾区高校外语人才培养的基本共识。但如一味推行国际化,而忽略母语文化的培育与传承,也会造成本末倒置,脱离外语教育的真正本质。当前大湾区的众多高校,无论从宏观的政策导向、还是微观层面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实践等,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道路的成功等阐释与传播在外语人才培养过程中有所缺位,其中,香港最为明显。长久以来,香港教育发展的定位是从国际社会中寻找坐标系,追求卓越教育,但完全看不到民族国家和社会重建导向,本土视野缺乏。^[35]倘若一味追求国际化只会出现种种矛盾现象:培养的学生对语言对象国的文化国情无所不知而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却含糊其辞,缺乏本土文化底蕴的积淀;面对国际友人,学生无法自如地对中国大文化或地方文化精髓进行有效传播;多元文化冲击下,个人主义盛行,个体过多关注自身实际需要而无法自觉服务国家战略。香港修例风波也反映出这种教育导向的弊端。国际化与本土化两者导向失衡,必然导致外语教育的人文价值无法充分体现,“中国文化失语症”明显,学生外语知识和外语能力庸俗化,滋生狭隘的外语教育观和学习观,家国情怀丢失,国际胸怀丧失,^[36]文化代际传承责任缺失。

(二) 国家意识尚未上升到外语教育规划顶层设计

外语教育政策恰当与否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和国际地位息息相关。全球化影响下,各国通过调整外语教育政策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美国的语言政策始终以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导向,增强语言战略意识。^{[37](P1)}日韩两国强调外语学习需有效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本土文化输出,注重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促使学生更热爱祖国。^[38]这都提醒我们外语教育规划需要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凸显国家意识培育。

但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育一直注重语言的工具性价值,而忽略外语所附带的文化因素对

学习者的冲击与渗透,外语教育政策缺乏传统文化意识的融入、爱国主义教育不足,本土意识不强。^[39]虽然,近年来外语教育国家意识培育问题逐步被学界关注,也成为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讨论热点,并进入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师培训内容,但仍未上升到外语教育规划的顶层设计中。目前各级各类外语教育规划文件均未对国家意识培育有明确要求。例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到“要适应国家经济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40]其中,对国际人才的定位并未提及需具备国家意识内核;《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外语类学生的素质要求是“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良好的道德品质,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人文与科学素养,合作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41]虽有“中国情怀”、“人文素养”等表述,但显然,“国家意识”的内涵隐现主要于“文化意识”,由于“文化意识”意蕴的双向性和混融性,在政治认同上迥异于“国家意识”,^[42]因此,国家意识培育的必要性和内涵并未在外语教育政策中充分体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亦是如此。外语教育规划纲要性文件是学科发展的方向盘,“国家意识”缺位,易使外语教育导向出现偏差,高校外语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实践更多聚焦于国际视野的拓展和语言技能的应用培养,随之滋生外语学习目的功利化、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形式化,外语学科工具化等一系列问题。

(三) 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实施尚未达到理想状态

自2020年《纲要》提出后,课程思政在各高校各个课程全面推行。大湾区大部分高校教师对课程思政本质内涵已形成共识,也积极通过各种形式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并取得一定成效。但课程思政是一个全新尝试,在推进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

教学主体思政意识与文化底蕴积淀不深。

教师虽认可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战略举措,但对其具体内涵和核心内容理解不到位,且主动承担课程思政实施的意识不强,多限于项目申报或课题研究;^[43]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度有待提高。大湾区经济发达,多元思潮激烈碰撞,外语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多有出国留学经验,部分教师对西方文化的认知度甚至高于母语文化。教学主体对中国文化的态度、认知度直接影响到课程思政的实施成效。

课程实施的思政设计缺乏系统性与协同性。外语专业教师虽能融入一定程度的课程思政教育,但思政目标设置尚不清晰、思政内容多生搬硬套,主观随意性强、评价体系缺乏思政维度指标,且教师关注点多在自身所负责的某门课程,或是某个单元的思政元素挖掘,缺少与负责平行或上下衔接课程的同行协同交流,易出现多个课程思政元素高度同质化,缺乏系统的体系建构,影响专业教学进度。

教学资源思政覆盖面不够。目前国内外语教材普遍使用对象国语料、本土内容偏少且不系统,^[27]国家意识培育元素缺乏,未形成以育人目标为内在逻辑的有机整体,^[44]教学资源的开发未充分体现如中国道路、中国文化、中国智慧等彰显中国特色的相关内容,中西文化比例失衡。另一方面,对于地方性区域传统文化精髓的内容在教学资源中更是罕见,如大湾区三大民系文化,几乎从未见过,缺乏接地气服务区域发展的教材或课程设置。

六、大湾区外语人才国家意识培育路径

(一)以课程思政为载体,将国家意识纳入外语人才培养方案

外语教育规划纲要外语教育发展的指挥棒。要强化外语人才的国家意识,须尽快将国家意识培育纳入规划纲要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和学科体系,做好顶层设计,以形成广泛共识的基础,发挥自上而下的指挥引领作用,从根本

上扭转当前大湾区外语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导向失衡的局面。其次,国家意识构建的重要媒介是教育话语。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是通过外语教育话语实践不断内化和习得的国家信念建构,^[15-16]与教学主体、教学内容、教学实践、教学评估等过程息息相关,通过跨语言、跨文化比较教育形成的课程思政叙事。^[21]而外语课程思政本质就是立德树人,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服务国家战略的外语人才,本然地具有国家意识的气质,^[44]与国家意识在本质内涵上具有高度耦合性和同构性。外语课程思政中所涉及的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等要素本质上都是国家意识的元素。因此,课程思政是形,而国家意识则为魂。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培育应以课程思政为载体,以国家意识为理论指导,以课堂教育为主阵地,从学科规划、专业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到单元设计开展自上而下地全员、全程、全方位,凸显新时代国家意识的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实现三全育人。

(二)树立外语教师国家意识理念,搭建外语思政虚拟教研室

教师是教学实践的主体。师者必以正。^[45]什么样的教师在一定程度决定教出什么样的学生。外语教学中涉及的外国文学作品解读、国际时事新闻热点分析、翻译学中的语篇翻译等,无不体现教师的社会意识和学术立场。教师的国家意识和思政素养直接决定学生国家意识培育的成效。显然,外语教师本身除具备精湛的专业知识,还应有强烈的国家意识理念、深沉的文化自信和博大的人文情怀。许国璋先生讲到,“学习外语、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不要把自己圈在只读洋文的狭小天地里,一定要具备良好的国学基础。”^[46]如果外语教师本身没有卓越的师德师风,没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及对母语的文化的深厚了解与认同,又如何培养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兼具的学生。因此,面向全体外语教师定期开展具有一定覆盖面和影响力的思政素养培训及传统文化专题讲座是非常必要的。加强教师意识形态教育,课程思政解读、优秀外

语思政示范课堂展示、教学案例分享、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尤其是大湾区文化的学习等都是培训的重点主题,目的是提高教师的国家意识、文化自信,提升思政教学能力。

其次是快速建立涵盖大湾区各个区域的教师共同体,搭建外语思政虚拟教研室,鼓励教师跨区域、跨高校、跨专业协同交流合作,形成开放型协同合作交流育人机制。跨区域协同可迅速整合各区资源,并形成辐射带动作用。港澳教师,尤其香港,由于历史等多种因素影响,教师的国家意识理念不强,教育目标缺乏民族意识和社会重建导向,文化认同度低,更需要通过大湾区教师共同体创设交流平台,协同合作,帮助港澳教师快速构建身份认同。中国经典文化、国学精髓对于广大外语教师来说一直是知识结构中的薄弱面,就需要依靠团队。跨高校、跨专业合作,邀请其他专业,尤其是思政教师、国学教师的加入,可弥补外语教师知识结构的缺陷,校际间交流互鉴,共同备课,资源共享,最终提升外语教师的思政教学能力。

(三) 重构课程体系,创新教学实践,凸显国家意识培育

中国要从“本土大国”迈向“世界强国”,要向世界展现中国道路的成功,中国文化的博大,中国发展的飞速,以及中国理念的和谐,外语教育须转变传统“西学东渐”的单向思维,建立“东学西渐”理念。^[6]坚持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互为主体的原则。国家意识的核心建构基础是国家认知,包含历史认知、文化认知、政治认知、国际关系认知四大类。^[7]那么外语教育的课程体系必然要系统、有序地围绕这四个大类增补融合相关课程。一方面增补,例如可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和院校自身情况,有序开设用外语介绍中华文化、中国历史、治国理政等课程,形成中华文化课程群,这种系统有序布局,可有效避免目前课程思政实施中出现思政元素高同质化的现象,保证教学进度。另一方面,外语课程本身就涵盖大量对象国的人文信息,可为跨文化

比较与反思提供大量素材。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如比较文学、国际关系、跨文化交际、报刊选读、中西文化互鉴等,有机融入国家意识元素,创新教学方式,以探究式、比较式等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在认知本土与对象国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思考、辨析文化之异同,形成跨文化思辨意识,以树立正确价值观。当外语教学从跨文化视角展开,外语学习便成为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价值取向、国际视野、文化自信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课程思政过程。^[47]再者,实践教学也是学生国家意识内化的一种方式。定期组织粤港澳三地学生进行国学文化等项目交流与合作,针对大湾区不同民系文化、非遗等进行考察,如粤剧、潮剧、木雕、功夫茶等,目前此类外语宣传片并不多,外语学生可通过拍摄录制相关外语系列视频,甚至可公开发布。这样不仅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也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更是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大湾区文化的有效传播。

(四) 开发彰显中国特色系列教材,构建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

教材是课堂教学至关重要的内容载体,其中所采用的篇章、话语、词汇、插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传递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为追求语言的纯正性,我国外语教育长时间推崇使用原汁原味的原版外文教材,但这种教材更多是宣扬西方的意识形态,极大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教材应该是以中西语言文化对比的方式彰显教材的社会主义价值指向、内容表征,通过挖掘母语文化的禀赋,以投射和再造的方式让外语教材充满中国民族的国家意识光辉。^[42]因此,重建一批能够弘扬中国文化和时代精神,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融入地方区域传统文化精髓的外语教材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如外研社出版的“理解当代中国”就是一套非常好的教材,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融入听说读写译等核心课程,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学会

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提高学生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其次,搭建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挖掘各类外语思政资源,从文化、地理、历史、时政、地方精髓等多个方面进行分类,鼓励教师进行资源分享,展示优秀课例或优秀示范性课堂,为广大一线教师提供教学素材,资源共建、成果共享。

七、结语

国家意识是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的基础。国际外围环境的变幻、大湾区的区域架构、战略定位以及外语习得的独特性,决定了国家意识是大湾区外语人才培养的重心。强化国家意识培育,才能真正培养政治立场坚定,立志服务国家的优秀外语人才,筑牢高水平人才高地的根基。本文从国家安全、人力资源和文化价值三个维度分析大湾区外语人才国家意识培育的逻辑起点,并论证“外语课程思政”与国家意识的同构性,结合当前的培育困境,从顶层设计、教师发展、教学实践、教学资源四个层面提出以外语课程思政为载体的大湾区外语人才国家意识培育实施路径,为大湾区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践行国家意志的优秀外语人才,也为外语课程思政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更为外语学科的时代规划提供良性保障。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国务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EB/OL]. (2019-02-18) [2023-07-17].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2/18/c_1124131474.htm.
-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 (2021-03-13) [2023-07-17].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习近平出席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21-09-28) [2023-07-17].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9/28/content_5639868.htm.
- [4]陈新仁. 全球化语境下的外语教育与民族认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 [5]杨枫. 高等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跨学科精神及应用理念[J]. 当代外语研究, 2019(2): 1-2.
- [6]杨枫. 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文化政治学阐释[J]. 当代外语研究, 2020(6): 1-2.
- [7]王真. 新时代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培育逻辑、内涵与结构[J].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3(3): 106-113.
- [8]王银泉. 外语教育国家意识与外语学科跨学科融合发展[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1): 27-46.
- [9]王靖潭. 国家话语能力视阈下外语学科国家意识教材观[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1): 93-102.
- [10]赵丹, 沈骑. 大学英语教材中的国家意识研究: 框架与方法[J]. 外国语文研究(辑刊), 2022(1): 103-118.
- [11]张法连, 陆贝旒. 国际传播视域下翻译教学中的国家意识培养[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3): 283-290.
- [12]徐斌. 高校外语课程思政中的国家意识培育[J]. 当代外语研究, 2021(4): 35-41, 49.
- [13]李丹. 语言学视角国家认同研究: 兴起与进展[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27(3): 144-155.
- [14]教育部.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EB/OL]. (2020-06-06) [2023-07-17].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6/06/content_5517606.htm, 2020.
- [15]杨枫. 国家意识的外语教育话语实践[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2): 1-2.
- [16]卫思谕. 在外语教育中贯通国家意识[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8-08(002).
- [17]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 译.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000.
- [18]于海. 民族精神意涵: 国家意识、文化认同、公民人格[J]. 思想·理论·教育, 2004(12): 3-9.
- [19]张华. 对国家意识发展的历史考察和理论思考[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9, 30(6): 40-45.
- [20]李桂东. 首届“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话语体系构建研讨会”综述[J]. 当代外语研究, 2021(3): 109-112.
- [21]杨枫. 国家意识与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兼论新文科视野下的外语教育实践[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2(2): 1-5.
- [22]阎国华, 何珍. 国家意识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培育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21(2): 13-21, 105.
- [23]许国璋. 论外语教学的方针与任务[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78(2): 6-15.
- [24]霍涌泉. 意识心理世界的科学重建与发展前景[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 [25]邱伟光. 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与生成路径[J]. 思想理论教育, 2017(7): 10-14.
- [26]肖琼, 黄国文. 关于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考[J].

- 中国外语, 2020, 17(5): 1, 10-14.
- [27]王会花, 施卫萍. 外语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路径探析[J]. 外语界, 2021(6): 38-45.
- [28]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7.
- [29]陆春萍, 李臣之. 共同体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国民教育政策探析[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3(4): 126-131.
- [30]杨枫. 关于我国高校英语专业中华文化课程建设的思考[J]. 语言教育, 2015, 3(2): 2-5.
- [31]朱孔军. 建设广东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 [EB/OL]. (2022-07-29) [2023-07-17]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22-07/29/content_612550.htm?div=-1.
- [32]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年鉴编纂委员会.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年鉴2019[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20.
- [33]文秋芳, 常小玲. 中国共产党百年外语教育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1, 4(2): 7-19, 89.
- [34]文旭, 文卫平, 胡强, 等. 外语教育的新理念与新路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0, 52(1): 17-24.
- [35]施雨丹. 比较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发展探析[J].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报, 2020, 41(1): 25-31, 41.
- [36]王文斌, 柳鑫森. 关于我国外语教育研究与实践的若干问题[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1(1): 1-12, 144.
- [37]文秋芳, 张天伟. 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构建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38]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MEXT). English education reform plan corresponding to globalization(2014) [EB/OL]. (2014-01-23) [2023-07-17]. http://www.mext.go.jp/English/topics_icsFiles/afiedfile/2014/01/23/1343591_1.pdf, 2014.
- [39]张天伟.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主要问题和思考[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1(1): 13-20, 144.
- [40]教育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EB/OL]. (2010-07-29) [2023-07-17].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1/s7048/201007/t20100729_171904.html.
- [41]教育部外语语言文字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S].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 [42]杨枫. 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时代困境、内涵结构与实践路径[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2(2): 91-96, 148.
- [43]张文霞, 赵华敏, 胡杰辉. 大学外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现状及发展需求研究[J]. 外语界, 2022(3): 28-36.
- [44]刘正光, 岳曼曼. 转变理念、重构内容, 落实外语课程思政[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0, 43(5): 21-29.
- [45]南怀瑾. 孟子与离娄[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 [46]王克非. 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6.
- [47]孙有中. 课程思政视角下的高校外语教材设计[J]. 外语电化教学, 2020(6): 46-51.

【责任编辑 刘红娟】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rriculum-Based Political and Virtuous Awareness”

WANG Zhen

Abstract: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regional structure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ts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the uniqueness of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have determined that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s the focus of cultivating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cultivat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from three dimensions: national security, human resources and cultural values, and explains the isomorphism between “foreign language curriculum-based political and virtuous awareness”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ombining the current dilemma of cultivat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ultivat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with “foreign language curriculum-based political and virtuous awareness” as the carrier from four levels: top-level design, teacher development, teaching practice and teaching resources.

Keywords: the Greater Bay Area; foreign talent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urriculum-based political and virtuous awareness